

# 论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三维基础

张三元,彭歆格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即不同文化的国家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个基本趋于一致的认知和理解。在利益复杂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共同价值的生成离不开三个基础:共同利益、文化联通、共同的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类共同利益构成了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现实条件。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离不开文化交往,文化联通是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文化基础。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虽然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为共同的善。共同的善是共同价值生成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共同利益;文化联通;共同的善;人类共同价值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9)03-0032-07

人类共同价值并不是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之上的抽象的价值观,而是人们基于自身利益和文化传统对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前提与基本条件有基本趋于一致的基本看法、评价标准以及目标取向,构成人们行为的一种基本规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是不同文化的国家和人民,如果这些国家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基本趋于一致的认知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只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块基石。与文化一样,人类共同价值既是生成的,也是实践的。共同利益、文化联通以及共同的善构成了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三维基础。

## 一、共同利益: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现实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向,因而在根本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离开利益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离开利益谈人类共同价值一样都是虚幻的,正如

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1]286</sup>

唯物史观从来不否认利益,恰恰相反,它把“现实的人”利益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落脚点,看作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从而看成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2]82</sup>。唯物史观对利益的理解是历史的、辩证的。所谓历史的,是指利益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有不同的利益。所谓辩证的,是指利益的性质、地位及其实现方式都具有相对性,因人、因事、因地而异。一方面,利益具有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二元结构。个人利益是指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政党、国家、民族的特殊利益,马克思也将其称之为私自利益、自私利益。共同利益是一个共同体内人们通过合作而形成的共同价值选择,是不同个人利益的交汇点。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个人利益是共同利益的基础,“‘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sup>[3]276</sup>。由于“现实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

**作者简介:**张三元,男,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二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彭歆格,女,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8AKS004)。

系之中,因而个人利益必须通过共同利益体现出来,或者说,个人利益的相互交汇融合必然呈现出“最大的公约数”,因为“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sup>[1]536</sup>。这样,共同利益实际上成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不是可能相互取代的、没有差异性的绝对同一,而是有差别、有矛盾的,两者相互制约、相反相成。每个人(自然的个人、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都有不可取消的私自利益,尽管这些私自利益之间有交汇点,但在阶级社会中,私自利益永远大于交汇点,这就必然造成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个人利益决定了共同利益的性质及其走向。另一方面,人的利益具有全面性和复杂性,其中,经济利益居于基础地位。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利益即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体现了人的利益,而在总体上人的需要具有无限发展的趋势,一个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会产生,因而人的需要具有全面性和复杂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方面。但不论历史如何发展,也不论人的需要或利益如何演变,物质利益的基础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离开物质利益来谈共同利益是不现实的。

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引导,甚至是一种超越,但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以共同利益为核心支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运动。这里所讲的共同利益,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强调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而在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是主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私自利益即特殊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利益主要是指作为民族国家在利益上的交汇。每个民族国家的利益都是不同的,但不同的国家利益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sup>[4]196-197</sup>。国际法学“权力政治学派”的缔造者汉斯·摩根索指出:“一国之国家利益不仅要明白自己的利益,也要明白他国的利益,一国之国家利益的界定应与他国的利益相协调。”<sup>[5]8</sup>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是在国家利益之间的妥协、协调和平衡中实现的,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二是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所讲的共同利益主要是立足于“现实的人”而体现出人作为“类存在”的利益,即“绝大多数人的利

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即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共同利益指人类赖以维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前提和基本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维护和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当然,人类的共同利益离不开国家利益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和实现,就很难说人类的共同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与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又构成国家利益以及国家间利益实现的保障机制,没有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实现就变得遥不可及。如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愈演愈烈的危机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及其人民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是实现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在尊重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利益的合作共赢。

在唯物史观中,利益主要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是人的需要,价值观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人的意识。在这个关系问题上,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6]591</sup>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对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决定着人们基本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方式。价值观是人们物质利益观念的表达,是人们利益诉求的主观反映。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有着不同的观念表达,即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利益是主体在实现自己需要的活动中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出来的价值选择,价值观则是以一种观念的方式体现出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需要及其实现状态。因此,唯物史观坚持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利益之于价值观的基础性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利益全球化,虽然这种利益全球化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即资本的全球化,但凡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即国家利益,或者说,各个国家是否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及加入的程度都是出于国家利益而作出的选择。尽管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共同利益,是国家的共同利益,但无疑具有自私性。只要存在着阶级和国家,没有自私性的国家利益就不存在。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关系的核心支点就只能是国家利益。由于各个国家都

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才有了利益冲突。政治冲突、军事冲突、地缘冲突以及贸易冲突等,实质上都是利益冲突;而国家利益冲突,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冲突。不同的利益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利益冲突必然导致价值观冲突。或者说,利益冲突是价值观冲突的根据,价值观冲突是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当前世界上出现了诸如恐怖主义、武力冲突、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乱象,表面上看是价值观冲突的结果,实际上是利益冲突的必然体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到处穷兵黩武,强制推行其价值观,深刻根源在于维护其不断扩张的国家利益。

有竞争,也有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这是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利益交汇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越来越成为我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包含着特殊利益的普遍利益本身就是国家的目的这一论断抽象地规定了国家的现实性、国家的生存。没有这一目的,国家就不是现实的国家”<sup>[7]260</sup>。在这个问题上,极端个人主义以损害别国利益来实现自己的私自利益,其结果是在给别国及其人民发展制造障碍的同时,也在给自己发展制造障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要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俱顾别国发展”<sup>[8]336</sup>。另一方面,“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sup>[1]335</sup>,共同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风险、危机与灾难,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统一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之中。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是:“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sup>[8]248-249</sup>这既体现了国家利益,也体现了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诉求,是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价值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国家利益中发现共同利益,并将维护共同利益作为各国共同的价值标准及其行为规范。

## 二、文化联通: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文化基础

人的价值观不仅根植于物质利益的土壤之中,亦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没有不

承载价值观的文化,也没有脱离文化土壤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看成是一个价值观系统,把价值观看成是一定文化的本质。人们在谈论文化软实力时,实际上谈的是价值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sup>[8]163</sup>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价值观冲突。也就是说,共同价值的形成必须以一定的共同文化为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没有差异的共同文化,经济全球化绝不会导致文化全球化。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犹如自然界只有一种花朵、一种颜色,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此,这里所讲的文化,不是指的文化同化,而是马克思所讲的“世界的文学”。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6]35</sup>。文学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文化的具体。“世界的文学”不是文学的同一化,而是民族的、地方的文学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即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这里所讲的文化,实质上强调的是多样性文化的共同性或联通性,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互鉴。

在唯物史观看来,文化交往既是社会交往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交往的必然结果和表征,而社会交往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需要发展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交往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实质即是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从而确认了社会交往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交往只是一种纯粹的物质交往,因为人是有意识的,人作为“类存在”,其“类特性”就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既是人的深刻本质之所在,也是文化的深刻本质之所在。在这种意义上,人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交往或思想交往就成为社会交往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归根结底,一切文化交往都是物质生产和交往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

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sup>[1]524</sup>。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确认了文化交往是社会交往实在内容的客观事实,甚至可以认为,社会交往本质上就是文化交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伟大著作中,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交往手段”等概念,而且详细论述了“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互相交往”、“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各国在彼此交往中”、“广泛的国际交往”等内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交往发展的历史轨迹: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交往从内部交往发展为外部交往,然后再进一步发展为世界交往或普遍交往。一方面,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和内部交往构成外部交往即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而一个民族自身整个内部结构也受制于内部和外部交往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的相互促进,“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sup>[1]540-541</sup>。在这个过程中,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相一致,文化交往变得越来越经常而普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

文化交往促进了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内驱力。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交往的产物,也是文化交往的结果。文化交往使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经济全球化有了一个基本的认同,这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必须以社会交往和文化交往的不断深化为基础。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时所指出的,“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sup>[1]574</sup>。随着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文化交往展示出文化互联互通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联通是社会共同体之间正常的或应该的文

化交往状态。交流是一种沟通,沟通是更深入的交流。各种文化是“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通则畅,恶而淤塞。尽管不同文化之间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的是学习、消化、整合、创新,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文化的本质要求。只有在普遍而全面的社会交往中,不同文化相互交流,才能实现不同文化的互学互鉴、包容发展。各民族文化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既是生成的,又是在发展中的,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因而是独特的。独特性或个性是各种文化生存和发展的依据,也是各种文化交流互鉴的价值之所在。一方面,在世界历史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一种独特的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其独特价值只有在文化的互联互通中才能凸显出来。近代以来,曾长期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文化失去了领先地位,但中西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不断地彰显出来,并正在为人类文明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只有在互联互通中才能实现发展,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才能发展为世界性的文化。文化既具有排他性,更具有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欢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sup>[8]283</sup>文化因包容才有互联互通的动力。中西方文化交流尽管屡遇坎坷,但一直在曲折中前行,呈现出在渗透中互补、在借鉴中发展、在扬弃中融合的总体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在不断给世界奉献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从而使自己不断地具有世界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化,也是在同其他文化不断互联互通中而形成的文化。

文化联通的目的和结果是在人们对彼此文化理解、尊重和认同的基础上寻求价值共识。文化联通本质上是价值观联通,是共同价值形成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方式,因而共同价值是人们对彼此文化独特价值的尊重以及对相互之间最大公约数的认同,即“和而不同”。费孝通先生主张“和而不同”应该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强调共同价值,并不是说要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而是讲的“和而不同”。交响乐之美是由各种乐器发出的不同声音而形成的和谐之美,大自然之美正在于由杂花生树、草长莺飞而形成的丰富与协调。共同价值指的是不同

文化之间的“和”——和谐,具体表现为不同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这是一幅情感相通、民心相通的和谐图景。情感相通和民心相通是共同价值形成的情感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社会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关系是从情感出发的,或者说关系是用情感来维系的。这个观点用在文化交往上也是正确的,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如果不同共同体成员对彼此的文化没有好感,缺乏感情,就不可能有趋于一致的认知。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低级阶段,而价值观则属于社会意识的高级阶段,没有趋同的社会心理,共同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 三、共同的善: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人格精神

共同价值的形成还不能离开人性的基础,这就是共同的善。在西方思想史上,共同的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可以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方面来界定它。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或将其看作是独立于共同体成员个体的共同体的善,或将其看作是个人善的集合,或将其看作是基本善。实际上,这些理解并无本质的区别,强调的都是共同的善或共同体的善。问题在于,何谓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有理解了善的实质性内涵,才能进一步把握共同的善之于共同价值的前提性意义。

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主要是从政治学意义上理解善,把善看作是人共同利益的维护、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古希腊哲学中,维护共同利益和实现幸福生活是共同的善始终如一的基本精神。柏拉图认为,“维持城邦”这个“共同体”是公民“至善与德性终极归宿”,而城邦的目的是整体的和谐、统一和强盛,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sup>[9]133</sup>也就是说,维护城邦共同体即维护共同利益是善,因而构成了共同的善。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sup>[10]152</sup>,人类的幸福生活“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的善业为依据”<sup>[10]157</sup>。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将共同的善看作是连接个体与共同体的纽带,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维护共同利益是公民的“共同的善业”,是构筑共同体的重要要素之一,而共同体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存,更是为了实现人类的“优良生活”。<sup>[10]7</sup>由于共同的善比个人追求的善更高级、更完全、更尊贵,个人只有在“共同的善业”中才能实现“至善”这一终极目的,因而亚里士多德将共同的善

升华为一种伦理学概念,或者说,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科学”<sup>[11]10</sup>。

近代以来,共同的善仍然是西方政治哲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它构成西方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以及社会现代性的根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强调“主权在民”,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的“公意”。公意是指全体订约人的公共人格,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它使“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12]20</sup>。在卢梭看来,公意不是众意,众意充其量是私利或特殊意志的聚合,而公意是没有矛盾的个人利益,是在扣除众意中相异部分之后所剩下的相同部分,它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是普遍主体的意志即人民的意志,因而永远是公正的,不会犯错误,总是指向共同的善。共同的善即指实现人民的共同福利、共同福祉或共同幸福是国家的目的。这样,公意和共同的善之间就构成了起源与目的的关系。这对康德的自由观和“善良意志”思想的影响是重大的,对西方关于共同体现代性意义的思考也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到了20世纪,法国连带主义法学派创始人狄骥将这一思想创造性地应用到法学理论中,提出了社会连带关系理论,认为“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即他们有共同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相互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因此,人们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的社会法则。连带关系并不是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sup>[13]252</sup>。社会连带关系的实质是合作共生。社会连带关系不仅是一个社会事实,也是一种共同的善,其重要原因在于合作共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目的<sup>[14]15</sup>。实际上,人类的共同需要中包含着生存和发展需要,或者说,生存和发展是人类共同需要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因而连带关系和共同需要之间构成了卢梭所强调的起源与目的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人类的共同需要是共同的善。尽管在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共同的善日趋异化,异化为个人欲望的满足,正如麦金泰尔所指认的,自由道德哲学的根本失误在于善的私人化。在当代社会,善的私人化正演变为日趋严重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危机:善的私人化正以资本逻辑的滥殇而冲击着人类文明的底线。时代呼唤新的共同的善观念的出场。

新的共同的善观念的出场,当然得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观念参与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观念应该成为新的共同的善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

其他文化中的“至善”一起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的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观念具有根本性,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向度。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来看,善是与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概念。《左传》、《论语》、《老子》等经典文献总是在善与恶、善与不善、善人和恶人等相比较中使用善这一概念的。《易经》中有“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的话,认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应该顺天之道,“遏恶扬善”。这些都表明,善和恶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的最一般、最基本的标准。在内容上,善与“义”、“美”等词同义,是好、福、贵、吉祥等的意思,而恶则与过、丑、坏、祸等相等同。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是一个纯粹的伦理学范畴,人们很少从共同利益的角度理解它,因而只有“善”没有“共同的善”,但这并不等于它缺少共同利益的维度,相反,共同理想人格却是它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是在社会关系中理解人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是从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之善的,或者说,只有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彰显出善,从而体现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高尚人格情怀。正因为如此,《国语·晋语》中讲,善是人的一种德性,“善,德之建也”,善即是德,德即是善。

中西方文化虽然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合作共生等价值观念,即拥有共同的善。或者说,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着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有时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但基本趋向是向善,这是文化本质的体现。任何真正的文化都是向善的,是善的文化。这就意味着,作为“类存在”,人类在整体上都是向善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断发展,其根源在于人类有一颗向善的心——追求幸福与美好。就此而言,共同的善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终极性的特点。历史性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善的内容、评价标准以及实现方式是不同的。现实性是指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从来不存在抽象的善,善是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美好性。终极性是指共同的善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提高而“臻于至善”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种共同的善。不管人类通向未来的路如何曲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永远是人类共同的最高选择。但这里

所讲的共同的善,是指人类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关键当口、面临新选择时应秉持的发展理念,它既不同于西方私人化的共同的善,也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纯粹德性的善,而是既借鉴了西方共同的善的合理因素,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基本精神,以人类生存和发展为根本价值指向的人格态度,是人类作为“类存在”而对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维护与创造,个体(自然的个人、国家、民族等)与人类共同体之间构成互为摄人的有机关系,个体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与追求人类的幸福生活,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共同发展理念之所以成为一种共同的善,主要是因为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特别是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企图重构国际秩序的霸凌行径,使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上升。如何破解这个困境?“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sup>[15]478</sup>面对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只有合作,才能共赢。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人类的共同的善。同时,这种共同发展理念之所以成为一种共同的善,还因为它与人的德性直接相关,或者说,它就是人的一种德性。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追求人类的幸福生活,需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蝇头小利与核心利益等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这与人的德性有关,或者说,是由人的德性所决定的。譬如,当全球问题日益严重并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是个人利益第一,助纣为虐、加剧危机,还是以人类整体利益为重,积极主动地合作应对挑战,化危机为生机,其实就是一个德性的问题。而德性与价值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sup>[8]168</sup>。也就是说,价值观是一种德,德是一种价值观,德是价值观的基础,价值观一定要体现出一定的德。既然如此,共同的善与共同价值之间当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共同的善构成共同价值的前提,而共同价值则是共同的善的升华和集中体现。

#### 参与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9.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14]曹刚.论共同善[J].伦理学研究,2016(5).
-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Discussion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Basis for the Generation of Human Common Value

Zhang Sanyuan, Peng Xinge

**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must be based on 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In other words, countries and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a basically uniform cognition,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the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mplicated interests and diversified cultures, the formation of common value depends on three foundations: common interests, cultural connection and common goodness. In essence,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s a community of share interest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mankind constitute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Values are the core of culture, and the common value of human beings can not be generated without cultural exchanges. Cultural connection i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common value of human beings. Although the cultures of various nations and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system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y all contain the common ideas and values accumulated by huma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common goodness. Common goodness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common value generation.

**Keywords:** common interests; cultural connection; common goodness;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责任编辑 刘家俊)